

试论《自由中国》的文艺栏目

张羽*

[摘要] 1949年11月创刊的台湾政论性刊物《自由中国》，在台湾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提供了大量颇具艺术品味的作品，并为台湾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范式。目前两岸的台湾文学史著述中，谈及50年代的台湾文学，多是简单划一地谈其战斗文艺。有关《自由中国》的研究也多集中在政治或经济等问题上，很少从文化和文学角度进行研究。本文以《自由中国》的文艺栏为分析场域，试图回到历史现场，探悉其与台湾文坛的密切关系，力求再现50年代台湾文学的多元风貌。

[关键词] 《自由中国》 50年代台湾文学 文艺作者群 主题 体裁

在目前的文学史著述中，谈及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学，被援引最多的评述如下：“足以流传后世的杰出作品，绝无仅有……”^[1]；“文学的收成还是等于零”，^[2]此等描述，是否正确描述了当时的实际状况，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948年及其前后，新生报《桥》副刊即有一场“如何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讨论，显示了文学者为繁荣台湾文学的勃勃雄心。不久之后，国民党即开始推行专制的文艺政策。《自由中国》便是在这样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诞生的。1949年11月20日，由胡适、雷震等创办的政论杂志《自由中国》在台北创刊，虽为政论性刊物，但每期必刊登两三篇文艺作品，出刊至1960年9月时，杂志被查封，总计出刊260期，前后正好穿越了整个50年代，成为“50年代台湾知识社群最看重的刊物之一”。^[3]本文拟以《自由中国》杂志作为分析场域，去看看生长于斯的文学景观，品味其中的文学意蕴，从而对50年代台湾文学的多元面貌进行分析研究。

一、《自由中国》文艺栏上的作者队伍群

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杂志编辑和“国际写作计划”(IWP)的聂华苓亲历了《自由中国》从创刊到被查封全过程。创刊伊始，她只是负责简单的文稿处理工作，三年后，随着文艺才华的显露，被爱才的雷震委以重任。1953年升任为文艺编辑后，聂华苓开始努力净化《自由中国》的文艺空间，针对此前杂志刊登了大量的反共八股文章，她提出要力求多刊登“情意须隽永，文字须轻松，故事须生动”^[4]的作品，明确表示八股、口号恕不欢迎。聂华苓努力把《自由中国》的文艺栏办得活泼多样，在不断的创新中，形成新鲜活泼的风格，其以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为主要形式，并经常刊载一些艺文消息。一批颇有影响的作家梁实秋、林海音、朱西宁、余光中等人的作品，也都是经她的手，在该刊上发表的。除了重视知名作家外，她还精心扶植过不少有才华但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如郭衣洞在该刊上发表过讽刺小说《幸运的石

*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头》和《被猛烈踢过的狗》，而他以笔名柏杨扬名文坛是多年以后的事了。聂华苓还很注意扶植一些正在成长的文学新人和年轻作家，如王敬羲最初在《自由中国》上发稿时只有22岁，在此后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其稿件发表高达十篇，还发表过金门前线士兵的文学作品，这些年轻作家都得益于《自由中国》的扶掖。由于聂华苓在此刊中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被誉为台湾最好的文艺编辑之一。

一个刊物拥有爱才的编者显然是幸事，《自由中国》因此聚拢了一批有才华的耕耘者，不仅有自由主义者的参与，还有大量女作家和军中作家的加盟。其文艺作者群可以开列出一大串名字：如胡适、梁实秋、林海音、夏济安、余光中、朱西宁、司马中原、吴鲁芹、司马桑敦、金溟若、思果、彭歌、潘人木、徐訏、琦君、孟瑶、张秀亚、聂华苓、何凡、陈之藩、於梨花、郭良蕙等等，颇为壮观。

（一）自由主义者 《自由中国》的成功首先得益于自由主义者的积极参与。战后进入台湾的大陆文化人富含多种文化成分，如以胡适、梁实秋、雷震、殷海光、张佛泉，稍后还有李敖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群都给《自由中国》提供过稿件。50年代中期，以胡适为中心组织的白马文艺社在纽约成立，成员有周策纵、唐德刚、林振述（艾山）、黄伯飞等人，他们自称为“中国文化第三中心”，也常从海外寄稿给《自由中国》，其文学创作明显具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些自由主义者多是一手写政论性文章，一手写文学评论，由于胡适多发表政论，单就文学而言，梁实秋对《自由中国》的贡献，可谓不小，他介绍了莎士比亚、欧威尔等人，写下了具有浓重的中国色彩的散文，颇富情趣和理趣，还对余光中诗集作出了精彩评价。“自由斗士”殷海光发表了《我忆孟真先生——自由巨星之陨落》（第4卷第2期）回顾傅斯年的生平、思想和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文章平实并处处显现真挚的光芒，不说讳饰的假话，他还怀着惺惺相惜之情评论过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第6卷第4期）。“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念对他们影响很深，他们独立于政治集团之外，遵从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理念，要当国民党的“诤友”，借助刊物为媒介，同道互助，共同发言，制造声势，形成某种“以杂志为中心”的知识群体，由于该刊很少刊登反共八股，也不参加党部组织的作家协会，所以一直受到民众的欢迎。

（二）女作家群 在《自由中国》上，发稿的女作家很多具有自由主义色彩，党派意识并不明显，但因为她们构成了女性群体为文的特点，因而在这里单独地论述一下。这一时期，大陆迁台的女作家在台湾文坛上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叶石涛说：“50年代是女作家辈出的时代，……以家庭、男女关系、伦理等为主题的女作家的作品大行其道。”^[5]在当时“风头最健”的女作家，如苏雪林、林海音、孟瑶、张秀亚、艾雯、琦君、钟梅音、徐钟珮、童真、郭良蕙、潘人木等人都在上面发表过文章。时任《联合报》副刊主编的林海音也常把作品交由《自由中国》发表，她的代表作《城南旧事》就发表在该刊上。这些女性作家多具有高等学历，加之推行“国语政策”，让这些女作家有很大的写作空间，她们所驰骋的文学空间，时而关注人生，普济众世，时而是颇具女性真情的阴性书写。这些作品的发表显示了对文学本身的回归，以及对文学泛政治化倾向的远离和反拨，标示出女作家的创作实绩，弥补了日据以来薄弱的女性创作空间，打破了文坛一向为男性主宰的瓶颈。

（三）军中作家群 50年代，《新生报》副刊、《中华文艺》、《中央时报》、《宝岛文艺》、《自由谈》、《自由中国》等刊物纷纷鼓励现役军人写作，成就了略带“草莽作风”的大兵文学，内中首推陈纪滢、朱西宁、司马中原，其后司马桑敦、郭嗣汾、公孙嫫等人也跟着纵横驰骋。这些军中作家写战争故事、乡土传奇、军旅生涯，以极敏锐的感悟能力表达中国人的精神，表现愚昧与博爱、利己与无私等心灵的斗争。虽然其中不乏大量的反共八股，如陈纪滢的《荻村传》、

金溟若的《歧路》等等，但不能否认的是，一些作品中除了有反共八股的内容外，还包孕着丰富的人性，如朱西宁、司马桑敦、郭嗣汾、公孙嬿等人的一些作品中充满了高度的念兹在兹的人性化关怀。

一方面是编辑慧眼识金，另一方面是投稿作家颇具原创实力，1957年时该刊的发行量已达一万两千份，不言而喻，在读者中的影响是很大的，编者适时发表了余光中、何凡、孟瑶、林海音、陈谐庭、夏菁、郭嗣汾、琦君和彭歌等人联名推荐胡适为诺贝尔文学奖金候选人的建议书，显示出其团结一切文学同道为繁荣文坛而努力的精神。我们从《自由中国》的具体编辑策略中，可以看出，编辑们不满于国民党当局的文化专制，倡导多元的文学创作，通过多刊载表现人性的作品来净化文坛，力争把《自由中国》办成一个展示当时重要创作的文化大舞台，也正是因此，才使《自由中国》的作品具有多元的文学色彩，从而形成了刊物本身的多元风貌。

二、文艺栏作品的多样主题类型

曾有论者指出，《自由中国》对台湾文坛的深远影响表现为有形和无形的两种，前者主要指对“温和的现代派”的形塑之功，这类作品有浓郁的人文精神和中西文学技巧交融的倾向；后者指对人生、人性描写的强调，使整个台湾文学的创作，总体上显得“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呈现出明显有别于大陆文学的风貌。^[6]力执台湾思想界之牛耳的《自由中国》，强调刊发多元文学主题。作为当时台湾比较重要的文化刊物，其选题内容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民主自由 首先，该刊在思想观念上，试图通过对西方式的民主、自由的提倡，扫除社会上留存的封建思想和文化。每期必刊的宗旨中，即有：“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在创刊号上，就重拳出击似的发表了胡适的《自由中国的宗旨》和《民主与极权的冲突》，殷海光的《思想自由与自由思想》，傅斯年的《自由与平等》等文，这些观点和主张与30年前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所提倡的“德赛”二先生如出一辙，都是从改革思想文化的角度切入大政治，走的依然是胡适的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老路。此后还发表了胡适的《三百年来世界文化的趋势与中国应采取的方向》（第8卷第3期）、《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九百年前范仲淹争自由的名言》（第12卷第7期）、《霍夫曼论自由》（第2卷第12期）、《自由与文化》（张佛泉 第10卷第2期）等多篇阐释言论自由的论文，配合这些论文，还发表了大量宣传自由和民主的文学作品，如上官予的诗歌《自由之歌》、王平陵的戏剧《自由中国》、惜梦的《自由的讴歌》等等。尽管《自由中国》受到政治打压而被迫停刊，使自由主义文学并未得到充分发展，但其所呈现的自由文学观念却有力地批判了当时流行的“战斗文艺”。

（二）“反共抗俄”的前期泛滥 40年代末，国民党建立了“反共抗俄”的文艺政策，受其影响，《自由中国》杂志最初四年是以“反共抗俄”为主旨，最早发表的作品就是陈纪滢的反共小说《孤凤孤雏》，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比较而言，朱西宁的小说笔法已见成熟，因此才会有同写反共小说的陈纪滢不吝溢美之辞称其小说为“一朵奇葩”，^[7]其《糖衣奎宁丸》和《拾起屠刀》成功地塑造了富家女子和农民形象。此后刊登的反共作品多是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现状的描写，《殉马》（长白）、《巢湖边上》（宛宛）、《血的洗礼》（欧阳宾），这些作品意识形态十分明显，反共意识也颇为强烈，由于多是臆想，写得生硬没有活力。有论者批评过这类作品多是“反共抗暴的公式化虚构故事，口号式的激动呐喊，以及浮泛的怀乡忆旧的抒情感伤，使得文学创作的艺术水准大为贬低。”^[8]1953年聂华苓担任文艺编辑后，提出了反共八股都不要，并写进了征稿简则里，自此，这类小说才日渐式微。这一文学现象值得知识分子反思的是：如何评价处在政治高压下涌现的大量战斗文艺以及当下的文学史写作如何书写这一文学现象的问

题。

(三) 绵绵的乡愁 1949 年以后,大陆的文化学人大量流入台湾。这些作家思乡念亲,写下了大量以“乡愁”为特色的“怀乡文学”,以张秀亚、琦君、朱西宁、司马中原、聂华苓、公孙嬿为代表。其作品多是对昔日生活的回忆,故乡的山山水水,民风旧俗,稚真童年都成了剪不断的离愁环绕在离人的身边,弥漫在台湾文学上长达几十年。以陈纪滢的长篇小说《荻村传》为例,虽然内中有反共的色彩,但在字里行间有很多对北方乡村的过年、庙会、焰火赛会的景象和棉花收获的场面进行细致地描绘;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对旧北京风貌进行了富有色彩和音响的回忆,表现出对故国的乡土人物和景色民情的眷恋。在这里,“绵绵的乡愁”主题与当时的“战斗文艺”有时交融,有时分离,在一定意义上超越战斗文艺的仇恨情绪,给文坛带来了清新之风。

(四) 爱情、婚姻和家庭悲剧 这类作品多是表现情爱生活,以林海音、孟瑶、聂华苓、郭良蕙、於梨华、彭歌、徐訏的小说为代表。他们多是对婚恋心理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质疑。如聂华苓的小说《葛藤》以男老师面对老实巴交的妻子和婚姻坎坷的寡妇的情感变化,暗示出“那层层的葛藤就像我们与生俱来的、摆也摆不脱的种种束缚。这就是人生”的深邃主题。其小说真实地揭示了心灵深处的感受,并将具体的情节和抽象的心理糅合在一起,具有深味。童真的小说《翠鸟湖》关注家庭的不幸,讲述舅妈不为人知的经历——家里请来的小伙计就是舅妈的私生子,但母子却无法相认的悲剧故事。於梨华的小说《又是秋天》、彭歌的中篇小说《落月》、徐訏的长篇小说《江湖行》等小说都对男女性爱关系的深层思索。这些小说很少见后来琼瑶式的言情小说“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俗套结局,多以其悲剧性的结尾,给读者更深的启悟。

(五) 人性的探讨 这类主题一方面表现在对人物善行的描写上,如朱西宁的《火炬的爱》写兵士陈群的生命观:“生命应该是一柱火炬,不计个人厉害,不计个人前程”。又如彭歌的小说《访画记》写方雨笙手中握有国宝级的名画,却过着清苦的生活,拒绝变卖,为的是不愧对祖先留下来的艺术遗产。还有两篇几乎同题的小说黄思骋的《乡村医生》和艾雯的《乡下医生》都倡导做人要有“一片诚意”。这些作品都致力于讴歌人性本善。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孩童的描写,寄寓了对纯真人性的歌颂。司马中原的小说《灼子》和《李隆老店》中的两个小主人公——灼子和二嚼吧颇象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灼子会找鸟蛋,养鸟,会唱俚歌,讲古记儿,二嚼吧是个善良、手巧的孩子,两个孩子都是属于乡土的灵魂。还有朱西宁的短篇小说《捶帖》里讲到两个天真稚气乡下孩子在墓碑上捶字的故事,他们面对大人世界里的复杂情事的好奇与追问,一派天真。这类小说几乎都是以雄浑的、质朴的大草原做小说深广的背景,在这种广博的天地间揭示纯真、自然的人性。此外,写人性使人感到震撼的是司马桑敦的书写,其小说《山洪暴发的时候》歌颂了纯真自然的人性,另一篇小说《在寒冷的绝崖上》虽然也是描写激烈战争,但作者独辟蹊径,着力描写战争中的亲情,孱弱的女人与无辜的孩子同时出现在这一残酷空间下,作者深入地刻画了连长的心理变化,为这一时期战争题材作品中少有的佳作。

综上所述,多样化的选题构筑了《自由中国》上丰富的思想空间,也显示了该刊在突破思想钳制下,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努力。

三、《自由中国》的主要体裁及其对 50 年代台湾文坛的贡献

《自由中国》的文艺栏目每期比较固定的体裁有文学批评和小说,其他如戏剧、诗歌和散文多是随机刊出。在刊物出版过程中,编者不断改进文艺栏编排的体例,从最初只有小说,

到第二卷第一期增加了散文和诗歌，第二卷第二期增加了文艺论文，正是这些作品使《自由中国》与台湾 50 年代文坛发生密切的联系。据笔者统计，在出版的 260 期中，共发表了 185 篇小说，散文 78 篇，诗歌 52 首，戏剧 4 部，文学评论 73 篇。

(一)文学批评 在 50 年代的台湾文艺中，《自由中国》始终都把理论文章放在重要位置，所选文章涉及文学领域广泛但又不失深度，一些文章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1. 关于文学的宣传与“为艺术而艺术”的讨论 《自由中国》编者的视线始终追踪 50 年代的台湾文坛，在众多的讨论中，最成功的当数文学的宣传与“为艺术而艺术”的讨论。虽然早在五四时期就讨论过该问题，但在台湾的独特政治形势下，隐含着对当局文艺政策的批评。胡适关于“为艺术而艺术”的意见在《新生报》刚一发表，马上得到拥护，周子强撰文表示：“所谓时代要求应该是势之所趋，而不是某个人所可规定所可先设的形式。”^[9]李金也认为，以政治的道德的目的，“倡导一个文艺政策的呼声将会导致文艺成为政治的伦理的派生物”，^[10]刘复之也指责官方对文艺的严格控制，其结果“将使得我们的文艺作品，一律成为政治性的口号和八股”，^[11]此番讨论使读者意识到，以人的尊严为基准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也促使评论者更新批评视角，在专制体制下对文学独立品格进行再确认。

2. 关注大陆文坛 《自由中国》对大陆的文艺政策、文艺思想进行了密切关注。徐訏的论文《在阴暗矛盾中演变的大陆文艺政策》对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进行分析，该文拥有客观的资料如丁玲、吴祖光、胡风、萧乾等人被清算的状况，具有一定的史料性。该刊还关注过茅盾、郭沫若、田汉、胡风、沈从文、萧军等作家，由于作者受政治影响，多是刻意夸大大陆作家不自由的创作状态。此外，该刊还对当时文艺现象进行了评述，徐訏的《曹操的改造》和孟戈的《中共上演的“曹操翻案”闹剧》都是探析大陆新编京剧《赤壁之战》和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对曹操的翻案。李经针对毛泽东的《论文艺问题》里的读者、现实主义、作者的创作原则等问题进行了分析。^[12]这些评论虽受一定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有些文艺批评因为借鉴了西方的文艺理论而与同期大陆的一些文学评论相比，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也为台湾文坛了解大陆当时状况提供了一个借镜。

3. 书刊评介 书刊评介是《自由中国》上最精彩的一道风景线，发表最多的是对小说的评介，如钟梅音分析陈纪滢的《荻村传》的文章《我看傻常顺儿》、周子强对张爱玲《秧歌》的评价、周弃子分别对徐訏的《盲恋》和苏雪林的《绿天》增订本的品评等等，这些述评的发表多是小说出版之时，对读者有很大的引导作用。如果说小说评介多以介绍为主，那么散文的评介则穿上了合适的理论批评的“鞋子”。最惹人注目的是殷海光评论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雅舍的主人被殷海光评价为“充满了灵性和具有风格的人”，其文章“最足以见人情世态”。^[13]还有周弃子为吴鲁芹的《鸡尾酒会及其他》作序，总结其为文特点以小入眼，以幽默著称。此外，还有聂华苓和公孙嬿等人的评介文章；值得重视的是，余光中的诗集《舟子的悲歌》一出版，梁实秋就写下了至今仍在余光中评论中占重要位置的诗评，称这是一部“相当纯粹的抒情诗集”，是一个年轻诗人写下的“艺术并不年轻”的作品。^[14]这里还应提到每期刊登的类似编后语的《给读者的信》，往往以极经济的篇幅来对刊载的文学作品进行评论，也是该刊的一大特色。

除了上述形成一定规模的文学批评之外，《自由中国》还介绍了外国文艺思想和中国古典文学，前者主要介绍外国名家作品、国外文艺思潮和文学理论，使该刊成为面向世界文坛的一个平台；后者则多集中在《红楼梦》等古典名著的研究上，这类论文颇有见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显示了对古老中国文化的深层次的传承与锻接。另外还对文学作品改编电影进行讨论，也颇见理论深度。这些文章揭示了《自由中国》与 50 年代文坛的深厚关系，在文学

理论上开拓出一个新的批评空间。

(二) 小说 小说是《自由中国》文艺栏又一重镇,取得了卓然可观的成绩,刊载了许多艺术品位独具的作品,其长篇小说4部,中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177篇。由于《自由中国》的刊载而名震一时的小说有很多,如《江湖行》、《又是秋天》、《葛藤》、《城南旧事》、《落月》等,这些作品在港台、东南亚的华人社会中,至今仍拥有不少读者。

1. “他传体”小说的风靡 这类小说的叙述者多以第三者的立场为主人公作传,对其性格命运的演变过程进行描述。徐訏的《江湖行》围绕着周也庄的经历发展来组织材料,名为江湖行,实为周也庄的个人传记,为当时“他传体”小说的杰出代表,从两性之爱中,透视出政治、道德、哲学、宗教等更为深奥的道理。孟瑶十五万言的《几番风雨》是专门为《自由中国》撰写的长篇小说,描写了富家女何小薇“不知自筑藩篱以自卫而毁于一旦。”此时的孟瑶正服膺浪漫主义,小薇本身就是浪漫主义的典型。这类小说多是表现时代与个人命运休戚相关,人物游走于历史空间,演绎出富含包孕性的个人生存体验。

2. 海外华文文学的出现 50年代中后期,随着台湾社会的逐步开放,留学生文学开始登上台湾文坛。在旅美作家中,於梨华和丛甦为《自由中国》撰写了很多小说和散文。1958年,被誉为“留学生文学的鼻祖”於梨华的《也是秋天》在《自由中国》上连载,震撼了当时的文坛,该文以全知叙事角度反映陆家子女在美国的生活,通过一些家庭琐事揭示出中美文化的冲突。此类小说多是在东西方文化冲撞的框架中描写留学生人生百态,对80年代以来的大陆留学生文学具有潜在的影响。继於梨华之后,另有丛甦邮来了系列有情节散文:《西雅图的秋天》、《黄昏在唐人街》和《蜗居和漂鸟》,抒写异乡生活的种种感受,将处于历史夹缝中的台湾人的生存状态逼真地再现出来。《自由中国》刊登的这些留学生文学为提高民族文学的水准和中西文化的熔铸,打出了一个清新的“手势”。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台湾留学生文学既丰富了华文文学的文化形态,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华文文学与西方文学互动关系的视角。

3. 女性意识小说的涌现 大陆来台的50年代女作家们多受过“五四”文化运动影响,性别意识相当强烈,^[15]其小说关注家庭婚姻、聚焦两性互动之情,走写实路线,提供了一幅幅女性心灵切片,这些女作家关注的并非家国重建,而是性别身份话语的书写,不是正邪善恶的分辨,而是婚姻家庭的内置性定位。“台湾女性小说第一块基石”^[16]的林海音在该刊上发表的小说《绿藻和咸蛋》和《城南旧事》都是以揭示女性的敏感心灵为务,逼真再现女性内心深层的禁锢与情欲。揭示女性的异国恋情当推郭良蕙的《错误的抉择》,描写了美国上尉约翰与中国舞女如丝的始乱终弃的情感生活,该小说擅长写女性的微妙心理变化,其中的情欲描写颇为精到,为其此后长篇小说《心锁》中引人大哗的情欲描写,显示出一定的预制倾向。剖析异国女性的心理有潘人木的小说《乌鲁木齐之忆》,揭示了善良的白俄女人丝泰拉被俄国人所威胁、利诱,最后家破人亡的悲惨境遇,对夫权和政权发出正面抨击。《自由中国》上诸多以女性为核心的述写,传达了女性定位的多元性,也显示出女性一旦拥有自己运作的文学空间,便成为文学场域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其必然超越原本左右文坛格局的政治视野。

《自由中国》刊载的这些小说为此后留学生小说、现代派小说和婚姻小说的大量出现奠定了基调。虽然其中不乏反共小说,但更大量的是不带硝烟战斗色彩的纯小说。小说结构主体的多样化也极大地丰富了台湾文坛,促进了台湾现代小说的长足发展。

(三) 散文小品 《自由中国》上,几乎拥有了当代台湾散文最重要的风格流派:或温柔敦厚,或写实逼真,或浪漫抒情,或幽默嘲讽,均呈各家之长。其类型大体可以分为三类:文

化小品、抒情散文和传记。

1. 文化小品 《自由中国》的文化小品重智慧和幽默,代表人物有梁实秋、吴鲁芹、陈之藩、於梨华、思果、夏承楹等。梁实秋的《杜甫与佛》具有浓重的中国色彩,颇富情趣和理趣。和梁实秋一样,吴鲁芹也是一位东西风范兼具的学者,先后发表了《鸡尾酒会》《文人与无行》、《谈小帐》和《邻居》等多篇散文,其散文随笔洒脱不羁,知识趣味盎然。思果的散文在内容上“只从吾人生活中的平常话中提炼出慧人的幽灵情趣”,^[17]《理发》和《主客》都是以轻松的笔调对日常生活的细节的思索与回味。陈之藩和於梨华的系列旅美散文构成了一大特色,非常富有文化性。前者写下了关涉科学精神(《泥土的芬芳》)、京剧的没落(《惆怅的夕阳》)等很有情趣的文化随笔。后者写来了《胃气与争气》、《白色小屋的主人》等六篇海外寄语,这些散文大部分是外国生活的随感录,更有世界性的眼光。这类文化小品在理性精神的操守下,进行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多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在缺乏思想自由的社会里,它们更能启发人们的自由心态。

2. 抒情散文 这类散文善于发掘日常生活所隐藏的多种隐喻,多以“我”为创作主述,意在展示私人空间,抒发自我真情。代表人物为琦君、聂华苓、张秀亚、王蓝、公孙嬿等人。琦君以倾诉型散文见长,第一篇发表在该刊的散文是《杨梅》,怀念父母的炽热情感。此后发表的《喜宴》和《凉棚下》都以回忆视角讲述故乡婚礼习俗和乘凉的故事。聂华苓的散文随笔《山居》以日记体的方式记录了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张秀亚的散文《短筒》和《日记抄》分别以书信体和日记体对日常生活进行饱含情感的纪录,充满诗意、富含才学,真是“清远超绝,纤尘不染”^[18]。还有王蓝的《画与我》和公孙嬿的《唢呐》等文,这种自叙式的话语方式多是操守着“爱的哲学”下的人生抒写,多是琐碎的、边缘的,往往更具有鲜明的个性。

3. 传记 作为中国现代传记倡导者的胡适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介绍一本最值得读的自传》中,将沈宗瀚的《克难苦学记》看作是“最有趣味、最能说老实话、最可以鼓励青年人立志向上的一本自传”。^[19]《自由中国》社的编辑也承其品性,发表很多传记类文章。雷震的《明察一年》回顾了自己读日本东京高等学校时候的一些经历以及个人的所感所想,文笔朴实,风格自然。其他忆人散文还有殷海光先生的《我忆孟真先生》、苏雪林的《一位驰誉法国艺坛的中国画家》、祝秀侠的《忆高剑父先生》和段永兰的《我的父亲》等文,这些传记作品共同构筑了《自由中国》上丰富而真实的人物画廊。

(四) 戏剧和散文诗 《自由中国》作为政论性的刊物,能够给戏剧一定的版面是难能可贵的。余水姬的两部独幕剧《解放》和《临别的光》因为急于表现教化作用,只剩下明确的说教。与其相比,王平陵的《自由中国》在人物设计和情节安排上,都显示出一定的水准。围绕黄鹏程一家在巨变时代所遭遇的种种际遇,揭示出时代对个人命运的巨大影响。直至台湾早期著名戏剧家李曼瑰发表了悲剧《女画家》,才使《自由中国》上的戏剧取得了实绩。该剧刻画了有才气的女画家一生用情于画画,最后献出了生命。剧情跌宕起伏,诗意的人物,诗意的剧情,与五四的写情型话剧如出一辙。正是《自由中国》对戏剧的高度重视,对台湾戏剧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至于诗歌,50年代台湾的诗社虽然很多,但诗风不很健康。编辑们意识到“新诗直到现在还没有固定的形式可资遵循”,^[20]于是先后发表了尤光先的《给胡适之先生的公开信》、周天健的《论新旧诗的出路》和夏济安《对于新诗的一点意见》进行自由的讨论。在发表诗歌理论的同时,编辑们鼓励进行身体力行的实验。《自由中国》发表诗歌最多的是余光中,这位从1949年开始写诗的诗人,发表在《自由中国》上的诗歌,多是少作,《给惠特曼》《归吻》《黄昏星》、

《冬》和《病室》等诗多是抒发诗人对祖国的热爱，对爱情的渴望，对生命的讴歌，这类诗作代表了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一翼。徐訏发表的《残更》、《死去》、《不宁》和《传记》等诗歌，语言自由随意，充满幽默气息，吸收了民歌、古典诗和西方现代诗的表现手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风。还有两人从欧洲寄来诗歌，其一是从考据、新诗到史评样样全能的哈佛大学的周策纵博士，他是白马文艺社的资深成员，其诗歌受海涅影响，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长诗《纽约》表达了理智上的追求与情感上的怀乡的分歧，还发表了《瀑布》、《心》和《给亡命者及其他》等诗。李经在美研究文学，除有论文送交《自由中国》发表外，《威尼斯之夜》、《半途》、《十字架》、《希望——给艾略特》等诗也在其上发表。这些欧派诗歌或为象征主义诗歌、现代派诗歌、意象抒情诗、哲理诗，侧重人生意义的书写，为《自由中国》带来了西化的气息。

四、结语

《自由中国》前后存在了 11 年，它目睹、记载和反映了台湾当代现实和文学，尽管两岸文学史家大都否定 50 年代的文学成果，但我们仅从政论性刊物《自由中国》上的文艺栏就可以看出：首先，从文化生产机制和艺术取向上看，其既受主流文学的影响，也承继了自由文学的余绪，使 50 年代台湾文学不只有反共八股，还有引人入胜的小说，精彩的文化小品，富含真知灼见的书刊评介等等，它们继承了中国文学传统，为台湾文学提供了文学的坐标，直接冲击了泛政治化倾向；二是由于编者主张发表色彩鲜明而单纯、反映人性的文学作品，对当时正处于阴霾期的台湾民众精神的提升，无疑意义重大。尤其对外国文学和古典文学的介绍，对开拓读者新知和深化学养有重要作用；三是虽然对于大陆文坛多持批评和贬斥的态度，但客观上揭示了台湾文坛与大陆文坛割不断的相关性，暗示了在国民党官方扫除“赤祸”的同时，《自由中国》里依然流淌着大陆母体血液的涓涓细流；四、从培养文学人才、传播文学经验、拓展文学市场等方面，扩大了台湾文学的影响力，在 50 年代的台湾文学生态中，《自由中国》作家和文艺编辑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由于他们的直接参与和编辑，显示了高人一筹的理论眼光和选题策略，自由思想和尖锐的笔锋使其在同类刊物中显示出不凡，极大地繁荣了台湾的文学园地。同时也促使我们对那些简单划一文学史的分析 and 描述进行重构，真实揭示 50 年代台湾文学更丰富的历史空间。

注释：

[1] 叶石涛：《台湾文学入门》，高雄：春晖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3 页。

[2] 彭瑞金：《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高雄：文学台湾杂志社 1997 年版，第 80 页。

[3] 应凤凰：《自由中国 文友通讯 作家群与 50 年代台湾文学史》，《文学台湾》1998 年夏季号。

[4] 《征稿简则》：《自由中国》第 8 卷第 6 期，1953 年 3 月 16 日。

[5] 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高雄：文学界杂志社 1987 年版，第 96 页。

[6] 朱双一：《自由中国 与台湾自由人文主义文学流脉》，范希周主编《台湾研究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48 页。这里的“温和的现代派”是指围绕《现代文学》、蓝星诗社以及留学生文学的作家和作品。

[7] 陈纪滢：《评介 大火炬的爱》，《自由中国》第 7 卷第 3 期，1952 年 8 月 1 日。

[8] 司徒卫：《50 年代自由中国的新文学》，《文讯》月刊 第 9 期第 19 页，1989 年 10 月。

[9] 周子强：《为胡适之先生有关文艺的谈话进一解》，《自由中国》第 8 卷第 1 期，1953 年 1 月 1 日。

[10] 李金：《我们需要一个文艺政策吗？》，《自由中国》第 11 卷第 8 期，1954 年 10 月 16 日。

- [11] 刘复之：《艺术创造与自由》，《自由中国》第 14 卷第 9 期，1956 年 5 月 1 日。
- [12] 李经：《戴五星帽的文学批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初步分析》，《自由中国》第 14 卷第 4 期，1956 年 2 月 16 日。
- [13] 海光：《雅舍小品》，《自由中国》第六卷第四期，1952 年 2 月 16 日。
- [14] 梁实秋：《舟子的悲歌》，《自由中国》第 6 卷第 8 期，1952 年 4 月 16 日。
- [15] 如《中央日报》的“妇女与家庭”版，常出现严肃性别议题争议的园地，常在《自由中国》上发稿的女作家如张秀亚、徐钟珮、琦君、郭良蕙、艾雯、孟瑶、钟梅音等人也常在其上发表文章。
- [16] 古继堂：《台湾小说发展史》，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38 页
- [17] 魏子云：《思果的人与文》，《文讯》革新第 8 期，1990 年 9 月。
- [18] 《给读者的报告》，《自由中国》第 11 卷第 7 期，1954 年 10 月 1 日。
- [19] 胡适：《介绍一本最值得读的自传》，《自由中国》第 12 卷第 1 期，1955 年 1 月 1 日。
- [20] 《给读者的信》，《自由中国》第 11 卷第 3 期，1954 年 8 月 1 日。

(上接第 25 页) 以及调整煽动民粹和挑起敌对的政策手段更是势在必行。这不仅有利于民进党自身的成长和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岛内政治、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

(本文为 2004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台湾地区政治文化与政治参与”的阶段成果，项目批准号：04BZZ034。)

注释：

- [1] 郑楚宣等编著：《政治学基本理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53、168 页。
- [2] 关培兰编著：《组织行为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524 页。
- [3] 孙彤主编：《组织行为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第 384 页。
- [4] 许玉林主编：《组织行为学》，中国劳动出版社，1996 年版，第 355 页。
- [5] 朱天顺主编：《当代台湾政治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 324 页。
- [6] (台湾)《中央日报》，1986 年 10 月 1 日。
- [7][8] 张建赓、王英：《民进党政治实力分析》，见全国台湾研究会编：《九十年代之台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年版，第 167 页、第 164 页。
- [9] 郭定平：《政党与政府》，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4 页。
- [10] 王国元：《组织行为与组织管理》，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年版，第 311、319 页。
- [11] 龚敏编著：《组织行为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332 页。
- [12] <http://www.ettoday.com/2004/07/18/108-1640814.htm>。
- [13] 陈振明主编：《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59 页。